

沫若
自傳

革命春秋

郭沫若



法 記
革 命 春 秋

(本名自傳·第二卷)

茅 盾 著 陳 北 平

第
二
卷

有 限 公 司

1947年5月第版第一版上海印0001—2000冊

1951年4月第版第四版上海印7001—8000冊

1951年6月第版上海印8001—10000冊

1951年11月第二版上海印10001—12000冊

書號(7) 字 乙 1—2 元 價 羊 20.00

新 華 出 版 社

(上海中央路一四號二樓)

光 臨 印 刷 廠 承 印

中 華
書 局

二 發 · 中 華 · 海 峽 · 開 明 · 聯 益 聯 台 組 編

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總 經 售



20,500

曲江河畔

北伐時代的照片，我手裏所存着的只有零星的幾張，都是我的內子替我保存下來的。那時她被留在後方的廣州，我偶爾寄了些照片和信回去，她都替我保存了下來。這兒所插入的一張也就是其中之一。

這照片的前列，左側是俄顧問鐵羅尼，中間是鄧擇生，右側的便是我。後列立在我背後只露出一頂帽子的，不記得是誰。中間拿着一把芭蕉扇的是我的勤務兵薛紹三，另一個是擇生的護兵楊昇。可惜紀德甫沒有被收在這裏面，他的照片，我手裏一張也沒有。

原片背後寫有兩行說明，是：『廣州出發後，搭乘火車至韶關，此乃翌朝在韶關曲江河畔待舟時。七月廿五日。』大約是北伐第二年的一九二七年在武昌寫的那時紀德甫早已陣亡，鄧擇生也跟着鐵羅尼跑向俄國去了。

由廣州出發時是在七月尾間，日期記不清爽了，照片是藝術股的股員攝的。

（一九三七年四月廿九日）

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二日所寫的我的童年的「後記」裏面有這樣的話：「自己的計畫本來還想繼續的寫下去，寫出我的前後在成都的一段生活，我的前後在上海的一段生活，這種字劃着這在北平土庫裏的一部草命草紙上。」

我的前後是字劃了。『我的前後』在上海的一段生活也便是今日本書寫的時候。那可以分爲大學以前和大學以後。大學以後的生活有一部分是保留在創造十年裡面的，只有大學以前的那一部分，特別是反映我期中的一部分，是脫了稿的。我在這兒想，她祇由學生生活一文拿來補缺，使它成爲我的前後和創造十年之間的橋樑。

此代這次也只是北伐期中的一個片斷，其意其後都不
曾完整地寫出，這也是一件憾事。時代相隔過久，記憶已
經模糊，自己是沒有編字的經驗了。好在在年代和自己的
精神活動上，少代這次和創造十年都是藕斷絲連地銜接着
的。因此就主要地把這兩種合併起來，而後之以革命為
這和原來所打中子的一部革命史也並不一致，但主要
的內容也不外是這里敘述的一回事了。

創造十年及其後編都有把創造記的歷史寫定，而缺
的就是北伐以後的創造記的那一部分。那與其讓那裏字
多寫上讓份也初幾月起來寫，更還寫一紙。

創作生活也是革命嗎？是的，在我們生活上是這樣。

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
高士

目 次

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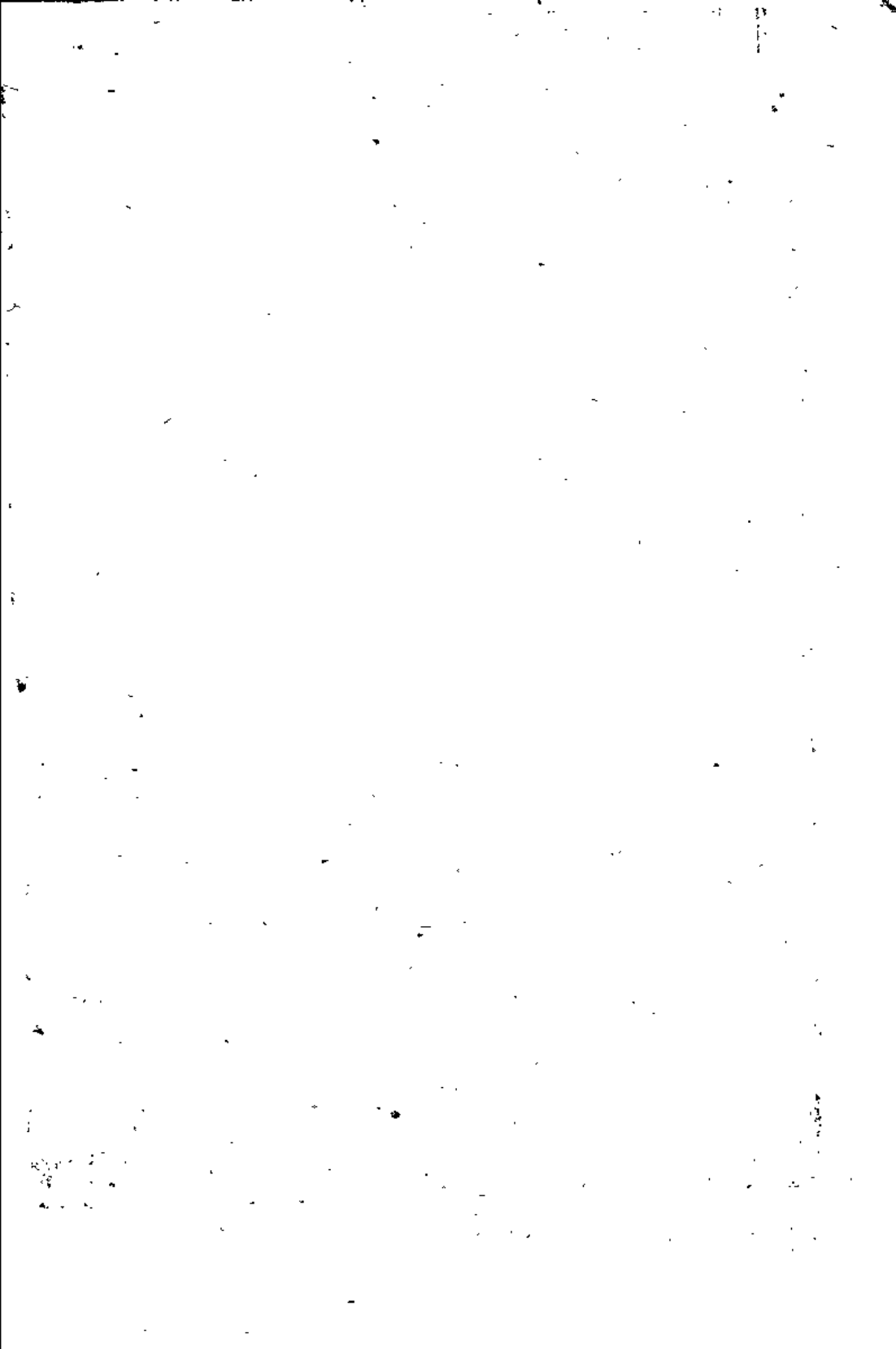
學生時代……………一

創造十年……………一五

創造十年續篇……………一七

北伐途次……………二六

學生時代



自呱呱墜地時起，便要從母親學習言語和一切智識，人生的開始應該就是學生時代的開始。我母親事實上是我真正的蒙師，她在我未發蒙以前就教我背誦了好些唐宋人的詩詞了。但我的發蒙是在四歲半的時候。家裏有一座家塾，面對着峨嵋山的第二峯，先生命名之爲「綏山山館」，先生姓沈字煥章，是隴縣的一位廩生，在我未出世前六年便到我們家裏來教書了。家塾裏除掉偶爾收納一兩位親戚家的子弟外，都是自己家裏的人，人數在十人上下。但這點小人數的家塾，拿程度來說，卻是大中小學乃至幼稚園都有。

發蒙時讀的書是三字經，司空圖的詩品，唐詩，千家詩。把這些讀了之後便讀詩經，書經，易經，周禮，春秋和古文觀止。庚子過後，家塾裏的教育方法也漸漸起了革命，接着便讀過東萊博議，史鑑節要，地球韻言和上海當時編印的一些新式教科書。先生又得到一部教會學堂用的算數備旨，根據着這書來教我們的算術。當時我們還寫不來阿刺伯數字的草書，因爲那刊本上都是用的楷書，而且算數不立程式，祇是算草，但那樣，在我十二歲的時候，已經把開方學完了。

科舉制改革的初期是廢八股，改策論，重經義，因此有一個時期乾嘉學派的樸學，就在嘉定也流行過一時。沈先生是不長於這項學問的，有族上的一位長輩郭敬武先生，在成都尊經書院讀過書，是王任秋先生的高足，他在流華溪開館。我的大哥澄塢先生曾經往那兒去就過學，因此又從那兒把樸學的空氣輸入了家塾來，教我們抄說文部首，讀段玉裁的羣經音義，但這些東西在當時一點也不感覺興趣，只覺得是痛苦。

做對子是六歲開始的，做試帖詩是七歲開始的，後來就改做經義論說，算還沒有學做過八股。數學演算是每天都要做的，算數備旨裏面的每一道問題都不會忽略過。點讀御批通鑑也是日課之一，而且還要抄御批，這項也是一樁刑罰，一長串的人名字點不斷時，最感覺頭痛。

是甲辰年吧，科舉廢了，各地興設學校。我們那偏僻的鄉鎮也有了蒙學堂的設立。省裏有武備學堂和東文學堂出現，我的大哥進了東文，二哥進了武備。但我們的家塾並沒有廢，我們的學課內容比蒙學堂的還要充實一些。我們只跟着蒙學堂的先生學過體操，同時在家塾的園子裏也備了一些運動器械。接着嘉定城裏有高等小學堂的設立，我考進了那個學堂，於是我的家塾生活便告終了。這大約是甲辰年年底的事。

嘉定的高等小學堂設在北門外的草堂寺內，學生的年齡程度極不整齊，有三四十歲久考不第的老

重生，也有十二三歲純潔無染的新少年。課程也極其零亂，凡是新式的課目與數學格致之類，教師都不能勝任。對於我自己在家塾裏已經學習過的人尤其不能滿足。我是鄉下人，年紀輕，因而常受城裏的老學生們欺負。第一學期的成績最優，老學生們嫉妬，發生撕榜風潮，並以不堪入耳的侮辱相加。先生們不能制止，反而屈服，因我端午節曾請假數日回家，便扣了我六分的總平均分數，壓到第三名，重新改榜，算把風潮平熄下去了。這件事對於我一生是第一個轉捩點，我開始接觸了人性的惡濁面。我恨之深深，我內心的叛逆性便被培植了。

在小學堂裏新的東西沒有受到什麼教益，但舊的東西如國文講話地方掌故之類，卻引起了我很大的興趣。帥平均先生的今文尚書講義是我最喜歡的一門功課。帥先生是廖季平先生的高足，廖先生也是尊經書院出身的王任秋的門下，帥先生的講義和我在家塾裏所受到的段玉裁的小學得到印證，因此特別感覺興奮。這種感覺在別的同學們的心裏似乎並沒有。

嘉定是適宜於讀書的地方，環境很好，山水十分秀麗。星期日在平坦如路的府河上划船，向青衣北岸的凌雲山和烏尤山去遊覽，遠望磅礴連綿的峨嵋山，近接波濤洶湧的大渡河，在那澄清的空氣中令人有追步蘇東坡之感。在凌雲山上有蘇東坡的讀書樓，有他的塑像刻像和題字，也還有好些遺跡，如洗硯池，戴酒時遊處之類。凌雲山的岩壁上，正當着舊大渡河口，與峨嵋山正對着，鑿了一尊大佛，這是很有名的，是唐

代海通和尚所鑿。在那大佛脚下河水匯爲一個深潭，地方上的人說：『是和海相通的，』雖然是荒謬的俗傳，適足以表現其處之深。在那深處產一種魚名叫『墨魚』，全身黑色，這是因爲太深罕與太陽光接近而致的吧，但俗傳是吃了東坡先生的墨水。這些都覺得富有詩意。而墨魚也確是可口。

在這高小時代，我得讀西廂花月痕、西湖佳話之類的作品，加上是青春期，因而便頗以風流自命，大做其詩，在學の後半期成爲了最愛鬧事的一個代表。第二年在端午節前後，我曾經被斥退過一次，但不久又把我的學籍恢復了，原因是學校的處置遭了學界上一部份人的反對。

嘉定中學開設了，高小學生中成績好和年齡大的便升入中學，我的高小學程於是一年半便告結束。新開設的中學，更是一場糊塗，笑話百出。講地理的人說朝鮮在中國的南方，講博物的人把烏賊的嘴當成肛門，甚至連講國文的人，不懂得『望諸君』是樂毅的封號，而講爲『盼望你們諸君』。一位英文教師把日本正則學校的課本來教我們，幾個拼音就教了我們半年。在這兒不是讀書，簡直是養老。我在這時候只想離開故鄉，近則想跑成都，遠則想跑北京上海，更遠則想跑日本或美國，但我們家裏不肯讓我們跑遠，自己也找不到那樣遠走高飛的機會。因而有一個時期便很自暴自棄，吃酒的習慣是在這時養成的。

在中學裏面感覺興趣的仍然是經學，黃經華先生講的春秋，是維繫着我的興趣的唯一的功課。黃先生也是廖季平先生的高足，他也很喜歡我，在課外還借了好些書給我。有一次我吃醉了酒，罵了一位從

日本回來的監學，這人並沒有多麼大的本領，只是愛弄詭辯，異常的專制，我特別的恨他。我辭了，罵了他，他一定要斥退我，還是黃先生力爭，又把我保全了下來。後來這位監學就在那年暑假，患白喉症死了，但我在下學期又因為別的事情依然遭了學校的斥退。

在嘉定遭了斥退之後，第二期的春初晉省，插入當時成都高等學堂的分設中學丙班。這是庚戌年的事。學校的課程雖然好得一點，但也好得有限。關於新學一方面的，如數學、物理、化學之類，因為教者本身都還不十分精通，怎麼也引不起興趣——不僅引不起，反而養成了我不喜歡這些課程的傾向。

在成都的一段學生生活中，根本沒有學習到什麼。張陞楷先生的歷史講義比較感覺興趣，但他不善講授，詳時詳到無以復加，略時略到只舉帝王的年號，他究竟是不會征服歷史，而為歷史所征服了的人。沒有東西可學，只是讀些課外的東西。林紓譯的小說，梁任公的論說文字，接觸得比較多。章太炎的學術著作當時也看看，但不十分看得懂。我自己是喜歡讀莊子的人，曾經看過章太炎著的齊物論釋，他用佛學來解莊子，覺得比莊子的原文還要莫名其妙。

遊山玩水，吃酒賦詩的名士習氣愈來愈深，東門外的望江樓、薛濤井，南門外的武侯祠、浣花溪、工部草堂，是常游之地。連學校在停課試驗期中，都把課本丟在一邊，和一些興趣相投的人在自修室內讀詩、繪、和

讀聯句，講小說。

因是省會的關係，學生的政治運動便比較活躍。我本是分中的插班生，但不知怎的，總每每被選爲學生的代表。頭一年的年底便參加了立憲請願的風潮，當時是趙爾巽做四川總督，學生請求他代奏，要清廷提早立憲，鬧到全省罷課要求的地步。起初學校當局大抵都是縱容的，但到後來趙爾巽下出嚴烈的命令，要學生復課，不然就要嚴辦，分中的校長自然也就奉命唯謹。但要學生上課，卻誰也不肯上課。他却想到了一個妙法，要各班的代表先行上課以爲表率，我沒有違從他的命令，就在當天便離開了學校。學校說是要斥退我，但因種種原因，依然沒有斥退。到第二年還讓我補受了學年試驗。

第二年便是辛亥年了，參加了有名的反對鐵道國有的風潮，這是開始於保路同志會，繼而成爲保路同志軍，結果和辛亥革命的大運動合流，而推翻了滿清二百六十八年的專制。這在當時的學生界中也惹起了一個天翻地覆的變革，有好多學生便借這個機會，離開了正規學校，而轉入了軍界或政界。特別是法政學校的設立風行一時，在成都一個省城裏，竟有了三四十座私立法政學校出現。大家都想做官，幾個月速成畢業之後便有考法官的資格，於是祖孫父子同學的佳話四處都是。因此也惹起了一種反抗，稍爲嚴肅一點的學生，大家都討厭學法政，我自己也就是這裏面的一個。

但就留在正規的學校裏吧，依然是沒有可學的東西。而且在那鼎革的時候，學校多是奉行故事，有好

些稍講人意的教員也都轉入了政界，剩給學生的便是焦燥、無聊、空虛。在當時有機會的人，便朝省外國外跑，不能跑的呢便只好陷着熬資格了。我自己在當時真是苦悶到了絕頂，要考省外的學校或留學吧，起碼要中學畢業資格，然而中學還沒有畢業。因此便錯過了很多的機會。在這樣苦悶狀態中，被逼着愈朝吃酒賦詩，遊山玩水，的道路上走。幸好這時期還不算很久，民元分中和成都府中學合併，再熬了一年，算把中學畢了業。第二年又進了高等學校，熬了一學期，便考上天津軍醫學校，我便得到了離開四川，也離開了那種煩悶生活的機會。

天津的軍醫學校是國立的官費學校，民二的夏間在全國各省招生，四川省被攤派六名，我被錄取了。暑間離開成都首途，但到了重慶，便遇着二次革命爆發，又折回成都。等那次的革命平熄之後，又由成都首途向天津出發，大抵是十月的下旬了吧，記得經過黃河大橋的時候，已經在飛着雪了。

自己當時事實上並不是存心學醫，應考軍醫只是想藉一個機會來離開四川，離開當時的苦悶。到了天津之後，雖然經過覆試，仍被錄取，但卻沒有心腸入校，我便獨自跑到北京去了。當時我的長兄橙塢先生在做川邊駐京代表，雖然到日本朝鮮去遊歷去了，但早遲是要回來的，我有這樣靠背，所以便決心跑去找他。這兒又是我一生的第二個轉捩點，我到後來多少有點成就，完全是我長兄賜予我的。

我到了北京，在一個同鄉京官家裏住着，等到年底，長兄才從國外回來了。起初對於我的求學也很感

棘手，後來決定把我送往日本。我是三十號離開北京的，由火車經過山海關、遼東半島、朝鮮半島，在朝鮮的釜山迎接了一九一四年的新年。

在釜山領事館裏面住了一個星期的光景，因為那時的領事柯榮階先生是長兄的同學，便又渡過日本，直達東京。在這兒開始了我一生之中最勤勉的一段時期，長兄送我離國的時候只給了我一條重六兩多的金條，叫我到東京去變換成日幣，作為學費。他希望我能够以半年或一年的工夫考上官費學校，不然將來的學費恐怕難以接濟。當時中國和日本有五校官費的契約，東京的第一高等學校、高等師範學校、高等工業學校、千葉的醫學專門學校、山口的高等商業學校，這五個學校都招納中國學生，凡是考入了這五個學校的留學生也就由中國政府發給官費。這五個都是日本的國立學校，考上了又有官費，因此為留學生所競爭的目標，也就最難考，有的考了八九年都還沒有考進去。我是初去想要以半年或一年的工夫去考，那簡直是沒有把握的事體。而且幾個學校招生在那時多在暑期，我是正月到的東京，要在當年的暑期應考，事實上還不足半年，但假使不考，那又非延到明年的暑假不可，學費便要成問題了。因此我在當時實在是拚了命，拚命的學日文，拚命的補習科學，結果我終竟以半年的工夫，考上第一高等學校，這在當年聽說是沒有比我更快的了。

日本的高等學校約略等於我們的高中，是大學的預備門。在當時是分爲三部，第一部是學文哲法政